青未了 人文周刊 齐鲁晚报
2018.9.23 星期日
A09—A10
阅 人 文 知 齐 鲁

大家 dajia

陆铭：城市化之辩与大城之解（上）

纽约、伦敦这些大城市人口的聚集，最终结果是好是坏？日本的人口出生率极低，但是东京的人口却在增长，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何启示？一线城市的房价还会上涨吗？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经济学家陆铭的《大国大城》一书，独辟蹊径。他认为人口流向东部沿海大城市，是经济规律，在人口的自由流动中，可以实现地区间发展的均衡。他的研究结果打破了很多一般认知，对中国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城市化，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本报记者 李师胜

规模经济之辩 A 特大城市人口能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住？

齐鲁晚报：对于城市的发展方向，您认为中国的平衡发展应该在集聚中实现。大城市越来越大，背后有发展规律支撑。那么，支撑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越变越大的规律是什么？

陆铭：很多人把所谓城市化简单理解为反对发展中小城市、鼓励发展大城市。其实不是这样的，城市的发展自有其客观经济规律。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是用行政力量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包括控制大城市的人口，不改革户籍制度以及限制大城市的土地供应。像这样的问题，实际上相当于给大城市的发展套上了一个金箍，导致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两方面的损失。

因此，我的观点是要给大城市松绑，要允许大城市发展。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去鼓励大城市发展。

至于大城市越来越大，背后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关键词——“规模经济”。大城市的规模经济主要来自于三个机制。

第一是分享基础设施。人口多，可以分摊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固定成本，比如，可以新建大规模的地铁交通网络。

第二是学习效应。大城市里，人和人之间有更频繁和密切的互动。同时，大城市也是高技能劳动者集聚的地方，人和人通过互动可以产生知识的传播效应，有利于创新和创业。另外一方面，在大城市学习过程当中，个人也可以产生专业化的效果。于是，可以积累自己的经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是匹配效应。学习效应产生了专业化。从劳动力供应角度来讲，消费者可以在大城市找到更加符合自己需求和偏好的服务提供者，企业家可以找到专业化的劳动力供给者。支撑中国的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的基本规律也是如此。有很多人认为，北上广深变得越来越大是因为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的质量本身就跟规模经济有关。另外一方面，虽然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在历史上有政府推动教育资源集中的行为。但是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变大的过程中，更重要的还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规模经济效应。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大城市人口变得越来越多是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规律。

技能互补之辩 B 产业升级就只需要高技能劳动者？

齐鲁晚报：您认为大城市中缺的不是大学生，而是像农民工这种“低技能劳动者”；同时对部分地方鼓励农民工返乡持慎重态度，请解释一下原因。

陆铭：社会各界一直存在一个误解，以为城市的发展容纳不了低技能劳动者，或者在城市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当中，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是越来越低的。在这种思想误区之下，城市开始选择高技能劳动者，提供更好的机会、户籍政策以及公共服务；对低技能劳动者，则部分忽视了他们的权利。而事实上，两者的关系是互补的，这个在我们的学术研究当中称之为“技能互补性”。生产环节里，更多的高技能劳动者需要相应的低技能劳动者为之配套：一个高科技公司也需要司机，也需要门卫。第二，在生活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高技能劳动者数量的提高，也会产生大量的对于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

那么，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的比例，大概是多少？以美国为例，城市里如果来了一个高科技人员，会产生五个劳动力的需求，其中有两个分别是律师和医生。以此作为参照，中国大城市里，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者，低技能劳动者的数量是偏少的。

低技能劳动者在大城市落户的门槛一直很高。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规律，低级劳动者数量偏少的现象最后转化出来的结果，就是低技能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岗位的价格非常高。比如说，在上海通常的住家保姆，价格可以高到八千块钱一个月，月嫂甚至可以高到一万五一个月。这些都跟有需求没供给的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有关。

搞清楚了这个规律，可以得知鼓励农民工返乡的政策，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如果我们承认城市是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人们收入水平，满足人们对于服务业数量、质量和多样性需求的地方，那么鼓励农民工返乡导致的是相对于他们呆在城市工作，其收入可能是下降的。然后服务的质量、数量和多样性下降也带来城市生活质量的下降。

同时政府还需要为鼓励农民工返乡的做法提供大量补贴。越是鼓励农民工返乡，越是导致中国农场的面积提高速度变缓，这就导致中国的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最后是农业也失去了竞争力。

虹吸效应之辩 C 平衡发展就是城和城之间的产业趋同？

齐鲁晚报：您一直强调城市圈规划、城市群概念。但有观点认为大城市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虹吸效应”，导致周边城市发展无力。对此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陆铭：现代经济发展特别是服务业发展，由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一定是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在大城市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集聚往往被“虹吸效应”这样带有负面色彩的词替代。换句话来讲，“虹吸效应”要表达的现象，其实只不过是现代经济普遍存在的经济集聚发展的客观规律。

跟集聚经济相伴随的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分工。有一些超大规模的城市更加集中发展高科技、现代服务业、文化等规模经济特别强的产业。而其他的中小城市，则依次发展制造业、旅游休闲等行业。

不同的城市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是一种经济最佳的状态，每一个城市需要有多少人口，相应地取决于这个城市发展的具有自己优势的产业能够相应的创造的就业。如果一个城市创造的产业带来了相应的就业机会，那么人口就自然而然地会流动到那些地方去。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反对的恰恰是每一个城市都在自己本位的视角上去思考问题，却产生了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经济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现象。

事实上，如果一个城市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带来了产业的集聚，它也同样集聚了相应数量的人口，那么城市和城市之间，在人均收入和人均GDP这个意义上的差距，反而是缩小的。现实中，普遍存在一个误解，把平衡发展理解为城市和城市之间产业的趋同和经济规模的缩小，而真正在市场经济下比较良性的状态，其实是经济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城市，但地区和地区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人均收入却是均等化的。这一点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已经实现。同样我们发现，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虽然越来越集中在广州和深圳两个大城市，但是珠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却是趋同的。

因此，对于大城市周边的城市来讲，还是要更多地融入到大城市所引领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进程中去，找准自己的比较优势和产业功能定位，避免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的无效的投资，否则可能得不偿失。

效率平等之辩 D 外来人口一直在抢占大城市的蛋糕？

齐鲁晚报：“很多问题从公正角度常常会理解为分蛋糕的过程，经济学家要关注的是，整个蛋糕变大还是变小的问题。”您怎么看待经济学家和社会政治学家眼中的公平。

陆铭：效率和平等，一直是紧密联系的两个问题，二者的兼顾也一直是社会科学家关注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既能把蛋糕做大，同时使分配更为均等，这是最佳的目标。但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可以解决所有不平等分配的问题。这个时候的确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来加以纠正，比如说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城乡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缩小的，但是由于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在大城市同时生活和工作，会导致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这个时候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应该通过城市内部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缩小人们的实际福利差距。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何看待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大家不妨这样想，如果进城农民工把子女带在身边，我们在城市里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学校，这样是不是可以实现平等的增进。同时，如果留守儿童一旦实现了更好的教育，是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证？而这个蛋糕做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被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分享到？于是蛋糕做大了，分得更平均了。所以我讲的这些道理并不是那么玄的道理，而是一些非常朴素的道理。

现在在大城市的治理政策中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觉得外来人口在抢占大城市的资源。却没有看到，其实大城市的资源、公共服务的资源的蛋糕，总量是可以增加的。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徐静 □美编：牛长婧 □投稿邮箱：qlwbxujing@sina.com